网络首发时间:2024-09-26 09:17:26

网络首发地址:https://link.cnki.net/urlid/62.1086.C.20240925.1126.008

2024年11月 第61卷第6期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Nov. 2024 Vol. 61 No. 6

网络舆情的符号化风险及其治理路径

李 红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网络舆情实际上是一种符号化实践,其符号逻辑反映着深层社会脉络。它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导致了公众内涵的变化、公私领域的混淆、后现代话语的弥漫、舆论的可见性等全新的舆论格局。它会导致论辩基础丧失、意识形态风险加剧、民意基础被抽空、舆论博弈彰显等系统性风险。它还造成了语言暴力、真实性危机、象征秩序破坏、思想性弱化等一系列具体的符号问题。据此,网络舆情符号化治理命题的提出,是试图在符号逻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网络舆情治理的方法论,以在符号表征、意向表达、秩序建构、认知模式等层面建立符号化治理的有效路径,最终实现整体社会秩序的善治。

[关键词] 网络舆情; 符号化治理;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G 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24)06-0062-08

[DOI] 10. 16783/j. cnki. nwnus. 2024. 06. 008

舆情治理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命题, 乃在于互 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皆可发声,皆 可参与。于此,舆情不再只是意指精英话语的公共 性意涵,而且还混杂了社会运动、文化冲突、社会 不公、利益争夺、政治斗争、意识形态等层面的内 容,从而导致复杂的社会危机和社会风险。这被称 为"舆情风险"。由于其底层性和弥散性,网络舆 情还彻底重构了社会结构、文化生态和政治逻辑, 使单一的"管理"模式不再有效,急切地呼唤多元 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网络舆情实际上是一种 符号实践,它具有丰富的符号逻辑,其中的内容传 播、意见表达、修辞论辩、秩序建构、文化生产等 皆有赖于符号运作实践。不仅如此, 网络媒介技术 总在通过改变符号与符号实践以影响舆论格局, 网 络社会结构也处于诸多全新符号形态及其符号实践 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之下,继而在舆论过程中造成 诸多具体的符号问题 (乱象)。当符号、舆论、社 会皆已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变化,它所提出的符号 化治理命题中的所谓"符号",已不再是传统意义 上的"符号",而是需要做全面的重新理解,并开 拓出一种全新的治理范式。当符号形态及其符号实 践呈现出全新的样态,传统舆情治理的方式必将面

临诸多挑战,而以符号化治理的方式回应全新符号 形态及其符号实践之下的网络舆情问题,则是必然 的逻辑出路。网络舆情符号化治理的思路即是:可 以从符号的视野出发去认知舆论格局及其变化,去 探索社会系统风险的符号渊源,并由此在根本上找 到网络舆情中符号问题(乱象)的治理之道,以在 符号认识论、符号实践论和符号方法论的角度提出 综合性的符号化治理命题。

一、时代背景:技术语境下的舆论格局

在主流学术脉络上,舆论(public opinion)不是私人性的言论,而是充满着公共或者公开(public)的特质,具有社会性的影响力,也对社会构成了无处不在的挑战。私人性话语是原子化、窃窃私语的,它无法流通,无法凝聚成社会实在。只有当言语获得了公共性的存在形态,它才能被流通、共享和传承,其传播范围及其相互关系,将重构社会存在形态。互联网的技术不但改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而且创造了各种全新的符号形态和符号实践,网络舆论不断地挑战着已有的舆论格局。从媒介技术变迁的角度,可以看到舆论深具全球性、公私混搭性、后现代性以及可见性等全新格

[收稿日期] 2024-08-20

[基金项目] 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研究"(DD23CMK02)

[作者简介] 李红(1977—), 男,贵州黔西人,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符号学、视觉修辞与华夏传播研究

局,它是对传统舆论形态的重塑,并导致了全新的 公共性内涵与社会性后果。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舆 论的格局,舆情治理便很难再单纯遵循精英式的管 控、理性、对话等立场,而如何推进网络舆情治理 则需要从舆情符号形态及其符号实践的维度展开探 索。

(一) 传播全球化重构公众内涵

舆论总是离不开公众,"在古苏美尔、巴比伦、 叙利亚和波斯等文明古国,即使最残暴的统治者也 意识到了公众的存在。"[1] (P30) 但是在不同的媒 介环境和语境之下,公众形成舆论的方式是不同 的。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公众大多数时候是被训 诫、规训、教育、说服和公关的"对象",而非自 主表达、行动以及参与的"主体","舆论"只不过 是精英的言论。古希腊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公民开 始走到了历史前台,获得了选举的权力。"民主" (democracy) 之意即由"人民" (demos) 衍生而 来,公众态度成为政治运行的轴心。即使在西方近 代公共领域中,民众 (mass)包括农民、女性等 群体虽然也能进出沙龙和咖啡馆,但他们总是被排 除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外[2] (P7)。他们既没有 影响舆论的能力,也没有影响舆论的手段,只能存 在于"他者"话语空间以表达自身,而资产阶级利 益则可通过公开批判获得普遍利益的表象[2] (P97)。除了社会的和经济的影响以外, 传媒的市 场化、垄断化也都在瓦解传媒的公共性,公众则由 文学公共领域的批判者转为了传媒内容的消费 者[2] (PP. 194-195)。而在电子化时代,空间感 的消逝 (no sense of place) 使各种基于空间认知 的身份趋于平等,公众概念克服了地方性和身份性 的意义,获得了普遍性和全球性的内涵。在此,公 众获得了一种全球视野,形成了世界主义观念;而 在另一方面, 国际的公众也会形成某种舆论的压 力。当舆论不再是国家意义上的实践或存在形态, 它甚至成为国家间竞争或者博弈的重要力量,从而 带来干涉主义、国家主权等霸权和反霸权的议题。 网络舆论常利用符号中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明 冲突等议题展开, 而我们通过符号机制及其符号实 践的考察便能洞察其中的秘密。

(二) 流动空间导致公私混淆

互联网对舆论而言,不仅意味着全新的空间、言论或内容,而且还需要重新定义上述问题,才能探索舆论发生的全新机制。网络空间(cyberspace)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地方空间,而是一个虚拟空间,但它并不意味着虚幻或者不真

实,而是可以无限延展,是一种"流动空间" (space of flow)。虽然它是弥散性的抽象虚拟存 在,但却能"把同一时间里并存的实践聚拢起 来"[3] (P505),最终形成网络社会。流动的网络 空间不仅包括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 织流动, 也包括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流动空 间的结构性支配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的意义和动 力, 意欲将其逻辑安放到分散化、区隔化的地方 里,从而导致两种空间的结构性精神分离,地方之 间的关联逐渐丧失,彼此越来越难以分享共同的文 化符码[3] (P524)。网络舆论一方面是全球化的, 另一方面则是在地化的。互联网技术使言语表达和 接受都实现了全面个人化或私人性,每个人都获得 言说或表达的可能,而且出现了信息茧房、过滤气 泡、群体极化等结构处境,由此,公众概念的内涵 便面临挑战。当互联网不断切入每一个隐藏、甚至 隐秘的空间领域,"公开"的前台与"隐秘"的后 台便逐步融合,"公共"与"私人"也会混淆不清。 这就对舆情治理中符号的可理解、可解释和可沟通 的公共性构成了挑战。

(三) 身份重构下的后现代话语

网络舆论表达主体的身份总在不断滑动, 其话 语是碎片化、个人化和情绪化的,是一种中心消解 的"后现代"话语形态。就互联网的发展历程而 言,门户网站实际是一种大众传媒,它遵循的仍然 是"一对多"(one to all)的中心化传播关系。其 舆论依然是精英主导,依赖于传媒公共精神,而大 众参与尚付之阙如。论坛与博客勃兴的互联网,则 为大众参与舆论提供了通道, 使舆论表达主体发生 了根本转变,舆论的"民间"或者"草根"意义得 以彰显。不过,此时的"草根"参与仍然更多依附 在某些热门"帖子"上,形成一种"议题性公共空 间"(topical common space)[4], 其参与是跟随性 的。而随着移动终端以及社交媒体的兴起,舆论不 再局限于某个空间(论坛或博客),不再是严格、 正式的言语行为,而是弥散在任何闲言、缝隙、断 裂当中, 舆论之"论"的说理性、对话性被碎片化 的个人化表达所裹挟。在此,能动性的"舆论"转 化为事实性的"舆情",公共性的抽象言论理想被 现实的复杂性所稀释。更重要的是, 网络舆论在根 本上颠覆了精英控制的舆论格局,草根(私人)不 但可以参与舆论,而且可以召唤舆论为我所用,从 而使舆论概念不再局限于组织化的媒体内容, 不再 局限于地域性的咖啡馆、沙龙等空间领域, 而是让 大众充分参与到舆论的普遍书写当中。这就破坏了

传统舆论整饬平滑的乌托邦理想,进入到复杂、冲突以及风险丛生的舆论生态中,呈现为一种不确定、无中心、多元化的后现代话语形态。它建立在符号复杂表意的基础之上,很难用传统精英主义式的纯粹理性、批判、对话等逻辑加以处理。

(四) 符号形态变迁的舆论意义

在互联网语境下, 舆论形态不再只是言语 (speech) 或者言论,而是进一步展现为行动力和 可见性。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理想的舆论形态是 建立在面对面、口语化和对话性基础上的,它对于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批判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但自 从出现了现代传媒, 面对面的舆论不再是主流, 而 更多是媒介化的"舆论", 甚或被等同于"新闻舆 论"。它依靠"议题"建立起来,即两个从未相遇 的人,能够以"社会想象"的方式"通过媒体讨论 的共同空间建立联系"[4]。而在互联网空间中,各 类主体靠通信协议、节点和平台连接或者汇聚起 来,其联系甚至超越了想象,是实实在在地通过通 讯网络连接起来的。人们的关联不只发生在"内 容"或者象征层面,还发生在资源和行为层面,使 "言语"和"行为"结合在一起。"行为"可作为舆 情数据被捕捉,并呈现为类似"热搜"的影响力。 于此, 舆情不是"言论"而是数据, 它不是有意图 的表达而是社会状态的"反映"。层出不穷的新媒 体使得舆论不再局限在"言语"上,而逐步呈现为 视觉化或者感觉化状态,以"意象"或者感觉流的 方式展开表达。因而,公共性便从言语和议题的公 共性,转而形成"可见的公共性" (visible publicity)^[5], 舆论之"论"便须重新理解,以审 视它在何种意义上展现为"话语"。当舆论从有意 识的论述进入到无意识操纵之中, 其独白性和霸权 性便成为一个亟待处理的命题, 而论辩性和批判性 也就逐步弱化了。

二、社会挑战:网络舆情的系统性风险

互联网所造成或者即将造成的影响尚未得到认知,但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它对社会、国家以及个人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正如卡斯特所言:"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6](Pii)。这种基于网络技术所构造的社会,必然会造成"创造性破坏",亦即"挑战先前在工业社会甚至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管理体制、社会秩序以及价值体系,必然会给社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7] (P4, P350),但也由此为社

会秩序的变革提供了活力。在互联网语境下,舆论中的话语方式、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主体关系、文化形态和制度规范等皆面临挑战,并在根本上导致系统性风险。为了解决社会"破坏"的问题,就需要不断规制社会变化、吸纳社会力量和调节社会变化,以实现社会治理的协调适配,保障社会稳定运行。[8]就舆论而言,传统的论辩、意识形态、民意以及公共性等问题都面临挑战,它们尽皆是符号学、话语分析等学科所关注的核心命题。符号及其实践正是舆论发生的底层逻辑,因而通过符号形态及其实践的探索即可把握网络舆情所致的系统性问题,从而为舆情治理提供基于符号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基础。

(一) 不确定性使论辩失去基础

在互联网舆论中, 真相、因果、知识等范畴不 再确定,论辩失去了稳定的保证。互联网是一个虚 拟社会,它在现代社会脱域 (disembeding) 的基 础上更进一步,建构出了一种赛博空间 (cyberspace), 甚至是元宇宙 (Metaverse)。在此, 真相所依赖的现实世界,已经被转化为了一系列数 字、数据和信息,它与物理世界失去了必然的关 联;新闻记者等专业性的真相生产者,也已让位于 个人性和策略性的普通大众, 真相难以获得职业化 的保障了。根据休谟(David Hume)的因果论, 因果关系并不是一种必然或者逻辑关系,而是夹杂 着印象或记忆等经验性关系[9] (P95),离不开人 的归纳或者归因。在网络舆论中,很多参与者的在 地经验是缺失的,他们只能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 而很难进行直接体验。"在界定风险时,科学的理 性垄断诉求破灭了"[10] (P19), 围绕因果展开的科 学或理性不再坚固,而"专家"作为一种现代系统 也跌下了神坛。舆论中日常生活的"知识""都是 在社会情境中被发展、传播和维持的"[11] (P6), 在流动的网络世界中, 变动不居的约定、习惯、认 知等关系便难以保证知识的稳定性。

(二) 全球性带来意识形态风险

在互联网中,全球与地方的张力使身份充满流动、冲突和博弈。互联网的全球化使得自我身份不再囿于地方性和凝固性的视野,自我认知充满多元性、流动性和液态化,继而便带来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冲击。在网络舆论中,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相映成趣,普世价值常成为操纵世界的手段。民族国家的界限不断地被互联网所侵越,某些强势的政治力量正可利用互联网之便以跨越国家的界限,实现对其他国家公民观念的重塑和操纵,从而使"颜色革

命""阿拉伯之春"等政治运动得以可能。全球媒 介网络已然成形,个人生活逐渐脱离了直接生活 圈,它越过国界、越过专家,深受远方道德的影 响,"当政府(还在)以民族国家的结构运转的时 候,人生却早已向世界社会敞开"[10] (PP. 168-169)。由此,网络主权、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命 题便应运而生,正如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言:"互联网已经成为舆 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 政权安全"。意识形态的发生是通过对主体的询唤 而实现的,比如通过"女性""自由""民主""国 家"等话语便询唤出不同身份的主体,使个体将自 己置于不同的社会位置和话语逻辑当中, 由此导致 观念、价值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互联网的不同之 处在于,身份是建基在现实与虚拟、固定和流动、 地方和全球、自我与他者等复杂场域当中的,其身 份的想象或选择充满着利益、认知、情绪、价值、 象征等不同的动机,并显现为权宜性、随机性和变 动性,从而让舆情充满难以预测的风险。

(三) 后人类技术抽空民意基础

互联网作为一种数字技术空间,其中的舆论总 是难以摆脱技术基础设施的制约。舆论不仅事关言 语实践,而且事关技术实践,民意不可避免地被技 术所中介化。技术的中介化对于舆论的影响,可以 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技术作为一种媒介,它 有助于舆论的拓展、扩散和影响;另一方面,技术 也构造了一种后人类的舆论主体, 使舆论的"表 意"功能真假难辨。网络舆情不仅涉及言语、图 像、影像等符号维度,涉及浏览、点赞、转发、跟 帖等行为维度,还涉及大数据、云计算、算法推 荐、社交机器人等技术维度。在此,舆论不再只是 传播者的"论",民意也不只是"被代表",它还展 现在积极的参与行动中。民意不再是如传统舆论那 样是被隐藏、原子化的, 而是可以通过技术被看 到, 舆论的主体也就拓展至了普通大众。但也正因 如此,舆论中的言语论辩或逻辑细节常被抽空而以 数据方式存在,其表意方式及其表意结构最终凝结 为技术理性, 而看不到对话的逻辑线索。就舆论主 体而言, 社交机器人、人工智能 (如 ChatGPT) 等"后人类"主体,已经作为一种隐藏的舆论主体 在进行内容的生产、参与和推动了。就此而言, "人"作为舆论主体开始缺席,后人类主体所生产 的舆论内容、行为和影响也许不再是民意的反映, 而只是舆论博弈或者舆情处置的一种手段。

(四) 私人性话语导致舆论博弈

网络舆论既包括公共性言说, 也包括大量私人 性话语,比如资本、流量、利益、感觉、欲望等。 互联网作为一种元技术,它蕴含了一对一、一对 多、多对多等所有传播形态,各种话语力量或者势 力得以进入到网络舆论场域中来。当话语融入到日 常生活中,它便不仅仅停留在"公共"维度,而是 充满"个人性"或"私人性"。不同话语层次混杂 在一起,便难以通过传统的认知范畴对其进行清晰 的把握, 亦即话语背后是何种利益、势力或者立场 者在操纵,它是否能够真正反映民意,便难以在 "公共性"维度进行追问。当话语交往理性的前提 不再牢固, 而是必须经过无穷追问或追溯, 话语便 很容易成为利益博弈的工具,而难以在共识层面建 立象征意义。在网络空间中, 舆论主体不只有作为 第三者的媒体或者网民,而且还有各种利益相关 者。如果说网民采取的通常是抽象的公共性立场, 那么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则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个体动 机,他们对公共性话语的征用,也无非是为了利益 博弈。因而,就私人博弈而言,网络舆情是否能达 成共识,获得公共性和理性,则是值得讨论的问 题。

三、符号问题:网络舆情治理的新命题

网络舆论的符号化实践,不但建立在言语或者语言之上,而且还建立在视觉之上,甚至建立在感觉和数据之上。在互联网空间中,符号不只是抽象之物,而且还是新媒介技术的后果,是对于人类感官的全方位征用。互联网的关键还在于"连接",它使得符号的形态、组合、流通、解释等都显得异彩纷呈,这对传统的符号形态及其实践构成了补充、叠加、重组、冲击和挑战,也由此重塑了人类的认知方式、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当网络从舆论之"论"转向舆情之"情",它就预示着符号不仅能够论辩,而且还能可见、可感和可量化,而所有这些都在通过影响认知的方式塑造着个人、社会和文化。于此,互联网便带来了一系列符号问题,对社会、文化、观念等层面构成了冲击,而舆情治理的目标便是通过符号化治理以重整社会秩序。

(一) 网络集群导致语言暴力问题

如果说网络舆论是现实舆论的延伸,那它不但 延伸了现实舆论的公共性部分,也延伸了现实舆论 中充满破坏性的部分。就网络舆论的破坏力而言, 它在表面上常显示为暴力化、霸凌性、侵犯性、战 争化等行为方式,而在深层则可能呈现为法西斯 化、政治化、军事化等系统性状态。前者在中国学 术语境中常被称为"语言暴力",它往往会对被侵 害人造成精神的伤害和困扰,比如"人肉搜索"、 污言秽语、谣言中伤、隐私侵犯等。但它不同于直 接暴力的地方正在于其符号性,是通过语言(或其 他符号)作用于精神而实现其暴力侵害的。精神伤 害的法律取证极为困难,这就导致语言暴力的治理 陷入困境。当它只是作为个体的只言片语展开时, 其伤害是微弱的,往往以"言论自由"的名义维持 合法性; 当它以匿名性、弥散性的方式"集体出 场"时,它就在舆论氛围上对被害者造成了围攻或 压迫,并最终造成"社死"化的社会排斥。如果说 互联网之外的语言暴力只是一种个体性或者小范围 的侵害, 互联网中的语言暴力则是以整体流通、相 互感染、集体行为等整体方式展开的, 其伤害性便 不可同日而语。但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 称的"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与此并不相 同,它试图通过符号实践以实现权力的支配,同时 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中实现共谋。网络舆论中的语 言暴力不是整体而系统的破坏力, 而是对具体个人 展开的攻击、威胁或者压迫,其伤害是显著的。

(二) 网络虚拟性产生真实问题

符号是对世界的表征,但是符号的表征又是片 面的。符号表征的问题即为真实问题,它处理的是 符号与世界的关系。但符号表征不是唯一的,而是 充满着真相的竞争,并塑造着不同的思维模式[12] (P10),这在符号主体多元化的时代更加明显。就 数字技术而言,网络舆情符号即面临着表征危机: 符号是数字计算的结果,它与主体、与世界之间的 关系经历了数字的中介化,因此出现了机器人宣 传、虚拟现实、超真实、深度伪造、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迥异于传统舆论的符号形态。而在信息接收 端,网络是一个相对虚拟的空间,舆论参与者不在 场,彼此置身于符号构造的世界中,符号与世界处 在两个难以贯通的端点;信息也失去了职业把关人 的控制或筛选,其可信度难以获得坚实的依靠。因 而,在网络舆论中,符号的真知性便更多在修辞层 面发挥作用,成为一种利益博弈的工具,必然充满 立场性、情绪化倾向。当然,对于广大"吃瓜群 众"而言,他们采取的往往是一种狂欢化态度,对 网络舆情中的符号真实问题缺少判断能力和判断动 机,往往是"以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就此而言, 舆论针对的已经不是某个对象性的"事 实",而是让自己成了需要被认知的"对象",它反 映的不再是真知,而是成了反映民意的"舆情"。

(三) 舆论分化挑战象征秩序

某些事件之所以成为舆情事件,是因为它们对 既有秩序构成了冲击或破坏, 从而引起相应的争论 或冲突。因而,从根本上说,舆情事件表征着某些 深刻的社会问题,可被视为某种社会症候,是对某 种象征秩序的破坏。舆情治理的目标即通过对象征 秩序的修复以重整社会秩序。网络社会是一个典型 的液态社会,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它不断地在不同 群体、不同世代、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地域之间流动, 从而使得基于某种既有基础的稳定价值、规则、文 化和秩序都面临冲击、挑战或适应的问题。互联网 的连接性使曾经隐藏的"异托邦"得以被看见,一 系列"异类"不断地涌现。它们既包括各种亚文化 群体的涌现、远方世界的展现、隐秘生存方式的显 现和跨国文化的辐射等,也包括网络文化中的圈层 化、极端化和民粹化等,都在纷纷挑战既有秩序的 主流性、精英化、公共性和理性等特质, 网络舆论 中的象征秩序亟需重构。在网络舆论中, 既有的符 号意义不再稳固,而新型的符号形态又层出不穷, 体现了象征秩序时刻面临冲击或危机的事实。

(四) 符号技术性导致思想性弱化

互联网是一个基于数字化技术而连接起来的社 会,它能够将物理世界、社会世界和观念世界加以 数字化或数据化,从而使物理、社会和观念皆被技 术化。在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看来: "整个宇宙……哪怕不完全是由符 号构成,也是充满了符号。"[13] 据此,互联网也是 通过各种符号组构和运作的,它作为一个"对象" 不仅仅是主体性的表达,而且是作为某种基础设施 或表征 (reprensentation) 体系, 具有强大的奠基 性或认识论作用。由此,"技术治理""智能治理" 等学术命题便应运而生,而切入到对内容、思想、 观念等层面的治理,则必须在符号维度获得理解。 根本来说,它们所导致的问题是:符号是在强力的 技术支配下被生产、流通、结构和解释的。比如社 交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下的内容生产,便 强烈地冲击着舆情内容的纯粹性, 使其民意表达功 能受到威胁; 热搜技术、算法推荐、智能聊天等技 术化呈现方式, 使其内容的可见性变得至关重要, 并决定其影响力的强弱;标签、超链接、超话等也 使"文本"组织充满了技术性,"人"在其中反而 丧失了。面对主体丧失、语言丧失和技术支配的处 境, 舆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充满主体性内涵的舆 论,虽然它的符号性并未丧失,但是却以迥然有别 的方式重塑着社会实在。

四、符号化治理: 网络舆情治理的新路径

学术界曾提出过"象征治理" governance) [14], "话语治理" (discursive governance)[15]、"治理的符号实践" (semiotic practices of governance)[16] 等命题。笔者曾就环 境议题提出过"符号化治理"的命题,认为它"是 基于符号实践 (semiosis) 而展开的治理模式,由 此,表征、修辞以及意识形态等符号力量得以被应 用到治理实践中来"[17]。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意义上,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它 强调的是文化的集体约定;而在皮尔斯(C. S. S. Peirce)的意义上,符号则是指向"对象" (object) 的意义载体,它具有强烈的表征功能; 在雅各布森 (Roman Jacobson) 和塞尔 (J. R. Searle) 意义上, 符号还具有情绪 (emotive) 性或者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它能 表达主体的内心世界;在奥斯汀(J. L. Austin)和 塞尔意义上,符号可以"以言行事",具有社会建 构功能,中国文化的"正名"论也是就此而言的。 据此, 网络舆情符号化治理所涉及的问题可以综合 理解如下:

(一) 符号与世界关系的表征问题/

符号表征问题始终是舆论研究的核心命题。李 普曼 (Walter Lippmann) 在其舆论研究中即发现 "语言作为意义的载体,是有着很多缺陷的"[18] (P53),它常常经历诸多压缩、简化、隐喻、凝固 等符号操作, 因而很难准确、动态而系统地表征客 体。宏观上它还能在符号系统支撑下形成拟态环 境,而人类则处于如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人状态中。 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索绪尔意义上是通过集 体"约定"被凝固下来的,其价值(意义)端赖于 市场交换式的系统和差异而实现, 是在符号结构中 产生的。在皮尔斯意义上,符号与世界之间除了规 约关系,还存在像似、指示等质性关系,两者之间 存在牢固的理据性(认知、因果、空间等),但依 然离不开规定、规则、解释等文化或主体的支撑。 网络舆情的符号化实践深刻依赖于新媒体技术,而 不再依赖于物理、化学、空间等理据性关系, 其表 意的物质性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不仅如此, 真与假、真实和虚拟、智能与人为之间, 也经历了 太多中介化环节,网络舆论的拟态环境特征更加显 著,最终形成一种后真相的时代症候。如果抛开数 字化中介不谈,各种符号形态始终在努力捕捉世界 的真实,试图通过推陈出新的符号形态对真相进行 去蔽,使真相得以敞开。新技术也在创造"虚拟现实",努力地构造元宇宙。当真真假假的符号形态不断涌现,舆情治理中的真相问题也就变得错综复杂,这就需要同时考虑到符号及其技术中介的更多细节,才能避免被卷入到符号表征的陷阱中。

(二) 符号与主体关系的意向问题

符号总是离不开人类主体:一方面,人类在通 过符号进行表达;另一方面,人类在通过符号进行 认识。前者通达的是人类的心灵深处,后者通达的 是外在的世界,但两者皆离不开主体,离开了主体 的世界也只是一个自在的存在。无论是面向世界, 还是面向他者, 主体皆以意向性建立起彼此间的关 系,由此它才能贯通主客间和主体间的关系,将宇 宙万物连为一体。但是,两者间并不是协调一致 的,而是存在冲突和协调的关系。主客间是一种认 识论关系,它需要的是排除价值、情绪、利益等私 人因素的影响; 主体间作为一种伦理学关系, 它也 需要排斥控制、独白、空洞等物化因素的影响。网 络舆情中的真相问题实为主客关系,但这种主客关 系总是深受主体间关系的影响,其中充满了主体的 价值、情绪、利益等修辞意图,使其难以保持在一 种纯粹理性的认识论关系之中, 网络舆情中真相的 复杂性也正基于此。当然,对于众多网民而言,其 符号的意向性常表现为观点、情绪、立场等形态, 通过符号即可把握其内在的心灵状态。意向性并不 只是个体性的,而是还有集体意向性,它是以"我 们"的方式进行合作的意向性,具有超出个体意向 性的集体目标[19] (PP. 46-47)。制度正是依靠集 体意向性才能得以维持,而它之所以引发舆情反 应,正在于诸多个体意向性的破坏及其彼此间的冲 突,导致制度承认或认同出现危机。舆情治理的目 标即在于获得某些制度、文化或者观念的集体意向 性,以最终重建社会实在。

(三) 符号分节与秩序建构的问题

在索绪尔看来,"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20] (P157),思想通过符号分节而获得物质化,其清晰度通过一个个的小肢节 (articulus)而实现。就身份而言,网络空间中出现了诸如屌丝、老铁、鼠鼠、亲、兄弟等不同称谓,从而建构出了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这些不断涌现的新型称谓,实际在既有主流符号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符号分节。这便建构出诸多非主流话语,形成某些亚文化社会形态,甚至对主流社会或者价值观形成挑战。而在前互联网时代,精英几乎完全掌握了符号分节的机会,他们通过符

号的分节掌握建构社会秩序的权力。此即儒家所谓 "正名":"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 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强调"制名"须得由"王 者"进行,而"擅作名""奇辞"则会导致"乱正 名"(《荀子·正名篇》)。在互联网中,总是不断 涌现各种具有圈层特征的黑话,导致不同圈层间理 解的困难; 污名化标签也常会被使用于国际舆论博 弈中[21]:不文明的污言秽语充斥着网络空间,使 符号失去了塑造秩序的潜能;诸多网络屏蔽的敏感 词,也时刻威胁着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因此, 新华社、国家语委等机构时常公布"禁用词",以 维持严肃表达的合法、权威、文明和安全; 世卫组 织在病毒命名中也禁止用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群 进行命名而只能采取希腊字母命名,目的即是为了 避免由此带来的污名化;某些图像、影像、声音等 符号的污浊内容往往会造成对社会秩序的威胁, 也 是法律、道德以及政治等规范所禁止的。

(四) 符号形态与认知方式的问题

符号具有认知的功能,能够穿透内外、因果、 相关、远近等认知障碍,以抵达更多不可见的主体 心思、客体内涵、对象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网络舆 情符号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探索其认知潜能, 以通过各种新媒体符号载体获得对于事实真相、民 心民意、社会文化、秩序规则、博弈力量等情况的 认知。如上所述,技术中介下的符号常常失去主体 支撑,使舆情很容易被社交机器人、水军等虚假主 体所操纵,而且也常失去与客体间的理据性联系, 其认知潜力在此两方面皆面临挑战。技术的平民化 使普通大众能够无所顾忌地参与到舆情中来, 符号 便成为一种修辞工具而非认知工具, 于是, 私人性 内涵常充斥舆论空间,从而使符号丧失了认知的客 观性和理性。网络舆情的符号形态也层出不穷,它 们不仅包括文字、图像、影像,而且包括行为符 号、表情包、游戏、H5、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虚拟数字人等等; 其组合方式也囊括了线性组合、 时空组合、超文本、超话、人工智能等,因而,互 联网符号不能再简单类比于语言符号、视觉符号的 认知模式。就感官形式而言,它们皆可全面作用于人类的逻辑认知、感觉知觉、沉浸式体验以及具身性参与,使舆情问题超越了传统舆论之"论"(opinion)的语言局限,而是充分调用了人类的感觉、知觉、理解、解释等意义获取方式。它们不仅只是符号载体或文化形态,而且还有数字形态的代码、数据库和算法等深层支撑,是通过对计算机硬件与软件原理及其所创造的文化对象的操纵所揭示的全新的文化逻辑[22](P8)。只有明白于此,我们才能通过符号获得对舆情的充分认识,并最终在认识论维度建构一种网络舆情符号化治理的方法论。

五、结论与讨论

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善治(good governance), 它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 是促进政府和公民合作管理的最佳状态[23]。如上 所述, 网络舆情作为一种符号化实践, 它已经对既 有的舆论格局构成了冲击,在言论上造成了系统性 风险,并带来了全新的具体符号问题,从而为符号 化治理的出场提出了强烈要求。就网络舆情治理而 言,它不只是一个行政管理问题,而且还是一系列 社会秩序和象征秩序问题。在传统媒体时代, 舆情 治理主要是对新闻媒体实践的治理,体现为一个官 僚制的管理、组织或修辞问题,而在互联网时代, 舆情治理则涉及到对社会的整体治理,体现为一种 主体间、多元化、对话性等符号问题。在此、符号 不仅只是控制和命令, 而是沟通和协商, 是通过符 号建构共同的知识、价值和象征,以在文化意义上 建立共识基础和象征体系,它同时囊括了现代和后 现代的文化特质。因此, 舆情治理就不仅依赖于传 统的管理学、组织学, 也不只依赖于基于现代性逻 辑的技术治理或者理性论辩,而且还严重依赖于反 思性语言范式的"元治理"。由此,它才能不断地 透视网络舆情背后层层垒叠的前提假设, 从而为舆 情治理提供基于符号化逻辑的洞察力, 并为获得公 共性的善治提供认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美] 爱德华·L·伯内斯. 舆论的结晶 [M]. 胡百精, 董晨宇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
- [2] [德]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 曹卫东等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3] [美]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 [M]. 夏 铸九,王志弘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1.
- [4] TAYLOR C. Modernity and the Rise of the Public Sphere [A]. in Grethe B. Peterson, ed.,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C].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3: 205—260.
- [5] THOMPSON J. Social theory,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life [M].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1994: 24-37.
- [6] [美]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 [M]. 夏铸九,黄丽玲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7] [美] 弗朗西斯·福山. 大分裂: 人类本性与社会 秩序的重建 [M]. 刘榜离, 王胜利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8] 彭波,张权.中国互联网治理模式的形成及嬗变 (1994-2019) [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8).
- [9] [英] 休谟. 人性论 [M]. 关文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10] [德]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M]. 张文杰,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 [11] [美] 彼得·L. 伯格,[美] 托马斯·卢克曼. 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 [M]. 吴肃然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12] [英] 赫克托·麦克唐纳. 后真相时代 [M]. 刘清山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 [13] PEIRCE C S .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1893 1913. Volume 2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394.
- [14] GREK S. Prophets, saviours and saints: Symbolic governance and the rise of a transnational metrological field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 Education, 2020, 66 (2): 139-166.
- [15] KORKUT U, MAHENDRAN K, BUCKEN-KNAPP G, et al. Introduction: Discursive Governance: Operational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A]. Discursive Governance in Politics, Poli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1—11.
- [16] LAZAR M M. Semiosis, Social Change and Governance: A Critical Semiotic Analysis of a National Campaign [J]. Social Semiotics, 2003, 13 (2): 201-221.
- [17] 李红. 环境议题的符号化治理: 理论与路径 [J]. 新闻界, 2022, (10).
- [18] [美] 沃尔特·李普曼. 舆论 [M]. 常江, 肖寒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19] [美] 约翰·塞尔.人类文明的结构:社会世界的构造 [M].文学平,盈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20]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21] 张志安,杨洋.互联网平台对国际舆论博弈的影响,机制与趋势[J].新闻与写作,2023,(2).
- [22] [俄] 列夫·马诺维奇. 新媒体的语言 [M]. 车琳译. 贵阳. 贵州出版集团, 2021.
- [23] 俞可平. 治理和善治: 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 [J]. 南京社会科学, 2001, (9).

The Semiotizing Risk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nd Its Governance Path

LI H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PRC)

[Abstract]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s actually a practice of semiosis, whose semiotic logic reflects the deep social context. With the suppor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t has formed a new public opinion pattern, such as changes in public connotation, confus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fields, the pervasiveness of postmodern discourse, and the visibility of public opinion. It will lead to systematic risks such as the loss of the basis of debate, the intensification of ideological risks, the evacuation of the public opinion base,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public opinion games. It has also caused a series of specific semiotic problems such as language violence, authenticity crisis, symbolic order destruction, and ideological weakening. Accordingly, the proposition of semiotizing governa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was proposed, which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methodology for governa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based on semiotic logic, in order to establish effective paths for semiotizing governance at the levels of semiotic representation, intention expression, order construction, and cognitive models, and ultimately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of the overall social order.

[Key words]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semiotizing governance; ideology

(责任编辑 王明丽/校对 维佳)